



培养国家意识 崇敬印尼国歌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最近在《CNN印尼网》看到一篇报道，日惹特别行政区(DIY)政府已于5月20日开始指定所有官方正式常规活动，在仪式前必须奏响印度尼西亚国歌，这项决定得到各界支持，当然也有一些“质疑”的声音，还有人认为1945年在血泪中高唱的国歌感到“不适应”。

日惹行政区地方议会(DPRD DIY)副议长胡姐(Huda Tri Yudianta)表示：“我支持这项活动，何况在民间如今不太广泛唱响印尼国歌，只有在少数特定的典礼中能听到。公务员及在校学生于仪式上还时常唱起，但是大学生及非正式(informal)企业员工，在乡村村落就很少唱了。”她担忧印尼国歌的普及率在千禧一代(Milenial)青年群体中被淡化，反而没有比“流行歌曲”更受重视。副议长的态度广受好评，也引发了民间舆论

的反馈。不久前，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卡立(Khalid Basalamah)讲道的视频，有某信徒提问：“儿子在学校每天早上须唱国歌，若不唱会被老师斥责，该怎么办？”卡立解答说：“不必跟随，我建议不要跟着唱。”此事马上引来网民攻击，认为背叛了爱国教育的路线。

《讲坛新闻》(TribunNew.Com)报道，卡立传经师终于坐不住了，29日在其Instagram平台上解释，相关视频是2017年在雅加达东区Jatinegara某教堂录制的，对于信徒的上述问题，他认为提问者是在不愿参与却担心被老师责骂的“承受压力的位置”，他说：“符合提问的内容，所以我当时回答，你不必跟随，意思是他自己不愿意参与该活动。我专注于他的难题，体会孩子在校的感受，而不是关于印尼国歌及歌词的问题。”

卡立继续说，他本人承认印尼国歌对全体公民的奋斗

精神有激发作用，鼓励信徒支持政府积极、建设性的活动。他也强调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，结尾处写道：“我希望传言造成的印象，误以为我禁止信徒参加咏唱印尼国歌，至此应该得到健全、理智的分析。”网媒评论认为卡立避重就轻，刻意模糊“不唱国歌”的关键因素，企图蒙混过关。

印尼长老协会(MUI)副会长安瓦尔(Anwar Abbas)认为卡立的解说没有问题，包含务实精神，“那是对被追问的反应，有人提问他的孩子唱国歌时有压力，当时卡立正传道并面对很多提问，所以只是简短回答，‘若有压力就别唱了’。我认同他务实的思路，如果勉强参加会导致精神崩溃，别让孩子因唱国歌而感到压力，为避免发疯，不唱就是了。”

安瓦尔相信卡立若有时间将会作出更详尽的解释，他也认可唱国歌能激发心里的自豪感。不过，他反对有人对

卡立的演讲断章取义，故意引发争论，背离虔诚信徒的所为。“人们只为挑事而已，其实并没有问题，庸人自扰罢了。那些人故意制造纷争，那是不好的。我读了澄清后，可以理解，谁说卡立禁止信徒颂唱印尼国歌？实际上完全不是。”此老言论显然偏袒短视，把事情本末倒置；网民反问：“学生为什么对国歌会有压力呢？”

当然，著名政论员阿德(Ade Armando)对卡立的这件事也不轻易放过。他在CokraTv的视频中详细解剖卡立立在一些视频中，教唆不愿唱国歌的信徒假装跟着唱，其实是念诵两段“祈求驱散撒旦迷惑”的经文。卡立更在屡次传道时宣称，虔诚信徒不许唱歌或听音乐，因为那是“撒旦毒箭”，信徒家中不可有人物肖像或雕塑，天使们不护佑这类人家。

说到唱国歌，人们不禁想起一段往事。《独立网》(Merdeka.com)于2016年6月

17日报道，时任雅加达省长的钟万学(BTP)在市政厅(Balai Kota)广场举行的省公务员(SKPD)就职仪式上，因队列外圈的其他公务员在唱印尼国歌时不肃立、不守纪律而深感不满。国歌结束后他大声问：“哪些是谁？唱国歌时还能东张西望。”他强调，每个公务员必须了解并领悟国歌的精神，哪些不会咏唱、不明白国歌精神(makna)的职员，应该自咎引退。

专家提醒，其实“不唱国歌”的暗潮在国内潜伏、滋生已久。2011年6月9日，有记者采访中爪哇省Karanganyar市Tawangmangu区某私立中学的初一学生穆斯多法(Mustofa)，该学生不会背诵“班查西拉”，不会唱印尼国歌，更不愿向红白旗致敬，他坦言在学校里不曾有过相关的教育。媒体的报道引发激烈的反应，根据进一步调查，该市的不少学生以及公务员都对印尼国旗、国歌持抗拒态度，反民族主义

的狭隘思潮已在该地区蔓延。

《国际日报》刊载卜汝亮的《总统选举纵横谈》，重申须有明智而强势的总统。但若立法、司法机构扯后腿，总统也欲振乏力。佐科总统去年底在一场讲话中感慨：“现在我开始明白了，毛病在这里，哦……在这里！我们将坚决打掉，用我独特的方式！”民众也见证总统用釜底抽薪之计逐步解决不少问题。不过，顽固的反动势力仍然伺机进行偷梁。

梁启超先生的名言：“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。”若学生们被导师、家长灌输反智、反科学、反国家的意识，在狭隘偏执、激进盲动的环境中成长；没有国家意识，没有爱国情怀，背离正信的教义，辜负国家的栽培。那么，他们的“理想”是什么？他们的前途命运在那里？国家的繁荣昌盛何时能实现？

没有一个强势的政党 改革时期不是新旧势力在博弈吗？

■ 巴厘：意如香

印华资深作家卜汝亮在《总统选举纵横谈》一文中，精辟分析了印尼政党的现状，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印尼政坛现实：到目前为止，印度尼西亚还没有诞生一个强势的政党，在来届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，各个政党都还没能推举出一个令国人信服的总统候选人。此一大胆的论断确实是一个符合印尼当前国情的判断，因为印尼政党的演变，虽然诞生了大大小小的数十个政党，却在历史长河中，在大浪淘沙下，好些所谓的改革派政党，都经不起历史考验而昙花一现，在改革浪潮中消逝了。

而现存的近十个政党，都称不上是代表新势力的强势政党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这些政党没有一个拥有正确理论信仰的先进党，都没有具备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党纲，绝大部分党干都是代表特定的利益集团，或家族财团的利益团伙，或是以宗教为名的教派组织。不同的是有些拥护

班查希拉国策，具有民族主义理念，有些是被财团利益操控，或推崇宗教信条，分为温和和极端两派，而极端教派仅为极端教义利益服务。政党之间各持其见，各自为政。并都力求在竞选中获胜而相互博弈，尤其是总统选举时期，都在极力推举各自党内人士，作为总统候选人角逐总统大位。

印尼的近代史，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，即苏加诺时期的独立时代(称为旧秩序)，苏哈多时期(称为新秩序)，以及苏哈多倒台后的改革时期。而苏哈多倒台后是印尼历史的分水岭，既是旧势力与新势力之间博弈的开始。有人说印尼改革时期的大选不是新旧势力的博弈，这是欠缺客观评价的主观评估。他们只凭印尼政党的成分组成，来判断政党的性质取向，而没有看到印尼改革开放后，民间的觉悟水平的提高，以及温和教派与极端教派之间的博弈，民众所代表的新势力崛起的作用。这种民间新势力的崛起，往往就在总统选举期间表现出来。

纵观印尼改革时期的多次总统选举，凡是能够推举民族主义者，与崇尚班查希拉殊途同归，多元文化理念的总统候选人的政党，都一定能够赢得民意支持度，获得最高的支持率，在国会里获得最多席位，而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，都成功获取最多选票当选为总统。如牛头党的梅加瓦蒂，民族复兴党的瓦希德，牛头党的佐科维。而佐科维总统十年任期内，还巧妙地化敌为友，把原先的敌对势力，分化瓦解成功吸收到内阁里为佐科维-阿敏政府所用，不失为佐科维总统的统战妙招。

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的呢？因为苏哈多倒台后，民间的觉悟性大为提高了，民众能够分辨苏哈多旧势力，与极端教派合流的政党不可靠，不值得民众信赖，因而民间沉默的大多数，都把选票投给了具有多元理念的总统候选人。这就是新旧势力的博弈在总统选举中的表现，是新势力战胜了旧势力最明显的彰显。所以绝不能武断地说，改革

时期大选不是新旧势力的博弈，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，会起到极为消极的误导性作用的。

历史已经证明时代在进步，虽然没有强势的政党，但只要政党精英能够明智推选，选用真正既有民族主义多元理念的候选人，在现代网络化时代里，就能够获得年轻一代的助力，在网络里为多元理念的总统候选人造势，就肯定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信赖，而击败友方，把原先的敌对势力，与极端教派困伙；从而赢得总统提名选举的最后胜选。

因此印尼目前虽然没有强势的政党，存在决定意识，确实令人无奈，但没有任何理由为2024年的总统选举悲观，历史证明，觉醒起来的民众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力量，相信沉默的大多数，相信印尼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，一股新兴力量已经在年轻一代心中，悄然崛起新生起来，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，改革春风早已在千岛大地上吹响，一切旧势力与极端教派，都会在新旧势力博弈中败下阵来。

祖父偷地瓜

■ 万隆：文苗

祖父在我幼年时逝世。记忆中的祖父，身高体瘦，略为驼背，短白胡须，双眼有神，和蔼可亲。祖父壮年时，一家四口挤居在大烟寮；毕生的精力，挥动锄头消耗在土地上。

当年，祖父的梦想：何时离开大烟寮？拥有自己的茅屋与耕地，不受压迫，自食其利！

祖父出生在中国广东省陆丰县东井乡。穷乡僻壤，一道小溪由东流向西，一条泥路南北向，架着木桥，横过小溪，把东井乡分为东村和西村。两村民各在所属的流域筑简陋的水坝，引水灌田。

夏季雨量稀少，溪水流量有限，然而，细水长流……东村人占尽地利，堵住溪水灌田，农作物茁壮成长；西村则得不到水源，农作物枯萎，甚至连家庭用水也成问题，因此两村人常为争夺水源而械斗……

祖父家在西村，祖传留下几亩薄田，赖以勤耕度日。然而，人有旦夕祸福！1915年，曾祖父患了一场大病，病情日渐加重，郎中束手无策。祖父心痛曾祖父被病魔纠缠折磨的痛苦，把田地抵押，筹款带曾祖父前往县城医院医治。几经周折，所幸曾祖父得以痊愈。

之后，祖父照常在田里耕种，然而，耕者无其田，成为佃户，泪水滴下土！遇到荒年失收，家中五口(曾祖父、祖父母、父亲七岁、小叔五岁)陷于饥荒断粮的困境……

祖父偷地瓜

断炊的某夜，出于无奈，祖父冒险，悄悄前往东村偷地瓜。粮食是村民的命根，若被发现抓到，带到村中被村民蹂躏，轻则断手折腿，重则人去抬尸回。

不幸，祖父被魁梧奇伟的大雄逮住，他怒气冲冲，咬牙切齿地揪住祖父破旧的衣襟，强拉祖父往东村……祖父声泪俱下道：“雄哥！请先听我说几句话，因为我早，溪水流量少，水源被东村堵住，西村农作物枯萎；家中断粮，家里老幼从早至今没进食，眼看饿得发抖的老父以及不断哭泣的两个小孩，不得已来偷地瓜。任雄哥打，绝不回手；我死不足惜，只可怜家中老幼……”说完，泪光满面……人非草木，此言触动大雄的恻隐之心！他松开手，长叹一口气，月光下，挥动祖父的锄头，锄挖自家田畦的地瓜，堆满祖父的竹筐，催促祖父赶紧回家……

祖父那番血泪语，缠绕着大雄心灵……难以释怀！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考虑……脚步沉重，慢慢走到家门口；突然转回头，急急阔步往前走，朝向东家水坝，开坝放水……

从婚礼到赴婚宴

中华文化的影响，在巴达维族的传统婚礼中亦可见一斑。婚礼前夕，一个被称作peti sia/si é(盛)的雕花木箱，里面装着聘礼，被两个人一前一后抬送到新娘家。用来抬箱子的竹棍叫做dolken。在雅加达及邻近城市(Jabodetabek)地区，当新郎从家里出发前往迎亲时，一定会放一串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作伴(爪哇人称为mercon，闽南人称为炮仔)，否则就算不上真正的巴达维族婚礼。

迎亲的队伍中，第二排是身着制服的习武青年，他们手里拿着被称为toya(棍棒)的中国特色武器——长棍。

中华文化的其他影响，还体现在被称为“中国公主装扮”的巴达维族新娘服饰上。我们当中的部分人，可能曾经看过丹格朗(Tangerang)土生华人的传统婚礼，并从中观察到土生华人的新娘服饰与巴达维族新娘服饰之间的异同。当然，后者也在许多场合出现过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在迪克·祖卡纳恩(Dicky Zulkarnaen)主演的电影《巴达维好汉——西彼东的传奇故事》(Si Pitung Banteng Betawi)(1971)中，土生华人的新娘服饰曾在“强迫婚姻”的场

巴达维文化中的华人文化(2)

■ 大卫·柯建豪(David Kwa Kian Hauw)



巴达维族新娘服饰具有浓厚的土生华人风格

景中出现。

巴达维族的新娘服饰，与土生华人的传统新娘服饰基本相同。中国公主款式的新娘服饰由一系列花卉图案的发簪组成。这些发簪会随着新娘的动作而摇摆，因此被称为“摇曳的花朵”。其中有四支带有图案的长发簪被称为发簪，新娘脸前的遮挡物则叫Siangko(八仙簪)。开襟在右的满族款式的新娘服装叫做Tuaki(大褂)，而下半部分的百褶裙被称为Kun裙或者(花

裙)。在新娘的背部、肩部和胸部，还有被称为Terate(云肩)的装饰。

Sincia(新正，即春节)前夕，从前的雅加达土生华人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习俗，就是要去西雅加达市的草埔(Glodok)和班芝兰(Pancoran)的夜市上购买海鲑和kue keranjang(甜糕)，送给岳父母或公婆或者未来的岳父母或公婆。许多人认为，这才是“懂礼节”的行为。因此，也不乏有准女婿或媳妇因为不知道要给未来



巴达维服装

岳父母或公婆送海鲑和甜糕的礼节，或者被视为“不懂礼节”而被取消婚约。如今，巴达维族人依然保持着这一习俗。他们会在西雅加达市的拉瓦巴龙(Rawabelong)的海鲑市场买鱼，所以这个市场临近春节时就会变得热闹非凡。如果出席婚宴，巴达维族人除了送物品之外还习惯送angpau/ampau(红包)给男女主人，这一点与华人的习俗相同。Ampau(ang-pau红包)就是用红色的、通常是带条纹的

信封装着的贺礼。

巴达维族人的聚会中，男人们通常会穿koko和sadar-ah，有人称之为tikim(对襟衫)，搭配峇迪裤子和围巾。Koko在闽南语中是“哥哥”或“大哥”的意思。大多数的青年才俊都穿着黑色的pangsi(纺丝)香云纱裤子。妈妈们经常用cukin(“背带”)来背孩子，用angkin(红巾)来束腰。从前的妈妈们都喜欢给小孩穿oto(肚兜)遮住胸脯和肚子，以免着凉。

出席宴会的时候，许多女士都会穿娘惹格巴雅(Kebaya Nyonya)。这种格巴雅是土生华人对巴达维族间接影响的产物。虽然来源于土生荷兰人即荷印混血人种，但格巴雅后来为娘惹(即土生华人妇女)采用并改良。荷印混血人种的格巴雅只有白色布料配美丽的蕾丝边，而土生华人女性(娘惹)的格巴雅久而久之就不再是白色布料配蕾丝边了，而是彩线的刺绣。衣服上绣着各种装饰图案，有各种植物、蝴蝶、鸟儿，甚至还有……网球拍！荷印混血人种的格巴雅衣角则是sonday(齿轮状)尖的。娘惹格巴雅后来被称为“阿姆格巴雅”(kebaya encim)，而这种齿轮状的衣边便是它的特色。Encim(阿姆)是“父亲的弟弟的妻子”即“Enc é k(阿叔)的妻子”。这种阿姆格巴雅后来为巴达维族女性改良，成为巴达维族在各种文化场合中的标准服饰。不同的是，巴达维人的娘惹格巴雅上不会出现如鱼、鹿、蝴蝶和鸟的动物图案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。未完待续)